



浙江财经大学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CEBD 简报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 A 类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
>>>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第 3 期
【总第 7 期】

目 录

01

.....
华生教授和孙涤教授携 12 名博士生访问 CEBD

02

.....
叶航教授出席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神经经济管理学术年会并作主旨报告

03

.....
CEBD 叶航教授应邀在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作学术报告

04

.....
CEBD 叶航教授和姜树广副教授的论文在《经济研究》发表

华生教授和孙涤教授携 12 名博士生 访问 CEBD

2019 年 9 月 23 日-24 日，武汉大学董辅初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和东南大学国家发展与政策研究院院长华生教授、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孙涤教授，携 12 名博士研究生访问 CEBD。

23 日下午，叶航教授在 CEBD 会议室给华生教授的 12 名博士生做题为“行为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行为实验、神经实验与仿真实验”的学术报告，旨在向他们介绍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国际前沿的研究动向，以及 CEBD 的研究背景。

叶航教授用 10 篇前沿文献系统展示了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挑战，以及这一挑战如何通过“行为实验”、“神经实验”、“仿真实验”三大技术和相应的“实验室实验”和“田野实验”、“脑成像”和“脑刺激”、“基于个体行为的仿真实验”和“基于社会网络的仿真实验”等六个具体手段加以实现。报告中和报告后，叶航教授仔细回答了博士生们提出的问题，并就该研究领域的技术细节进行了辅导。



报告结束后，华生教授、孙涤教授和博士生们在叶航教授的陪同下，参观 CEBD 的“神经与行为经济学实验室”（Neuro & Behavior EconLab），实地观摩了脑成像、脑刺激、脑电仪、眼动仪的实验操作，零距离感受科学实验手段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24 日上午，华生教授、孙涤教授一行在经济学院院长胡亦琴及叶航教授的陪同下参观了浙江财经大学的孙冶方经济学奖文献馆和诺贝尔经济学奖文献馆。作为第二届孙冶方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华生教授欣然题词留言，并在孙冶方铜像前留影。



24日下午，华生教授与孙涤教授分别为CEBD的教师与研究生作了题为“中国经济改革路径回顾”和“投资决策的理论与实践”的学术报告，并与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叶航教授出席中国技术经济学会 神经经济管理学术年会并作主旨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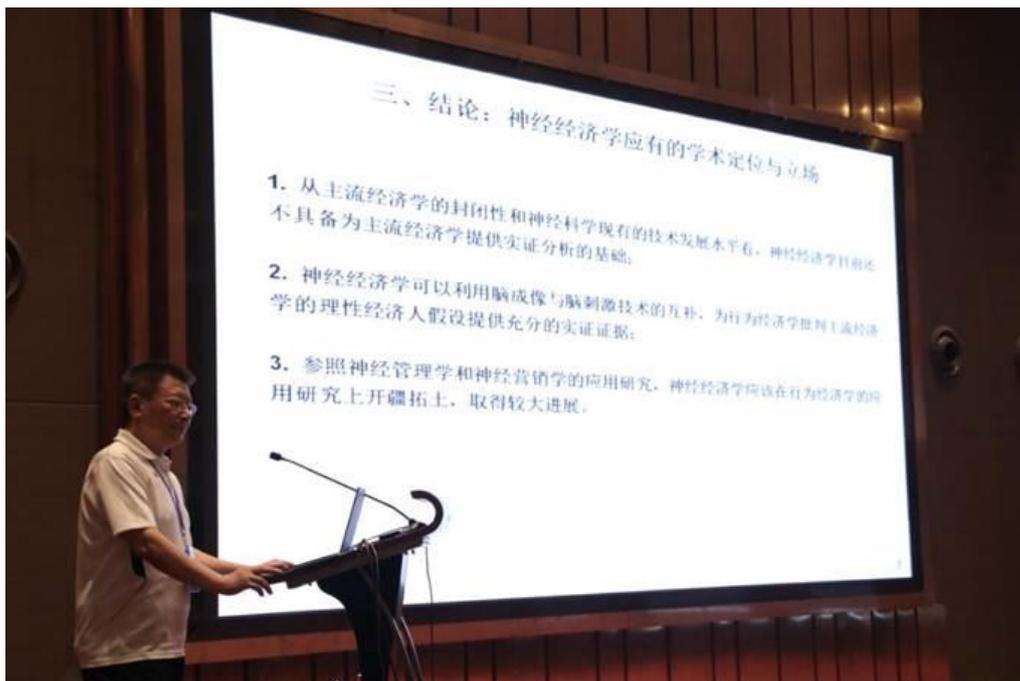
2019年7月19日至20日，由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神经经济管理专业委员会、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神经管理与神经工程研究会主办，宁波大学商学院、宁波大学神经经济管理学研究院承办的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神经经济管理专业委员会暨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神经管理与神经工程研究会2019学术年会于宁波逸东豪生大酒店东洲厅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南大学等国内40余家高校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共同参会，交流神经经济与神经管理的研究成果及应用。年会由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神经经济管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金佳副教授主持。

19日为国内论坛，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神经经济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庆国教授作大会致辞，热烈欢迎国内外同僚参会交流，对领域内研究学者寄予厚望，希望能够积极发表新文献和新著作。整个会议围绕“神经科学驱动下的管理决策”主题展开学

术探讨，各专家学者交流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方法，研究动向，研究进展。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兼首席专家叶航教授作《主流的捍卫者抑或批判者？——神经经济学的学术定位与立场》的主旨报告，报告以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为背景对神经经济学、神经科学在经济学研究的作用和意义做出一系列阐述，并提出神经经济学的学术定位和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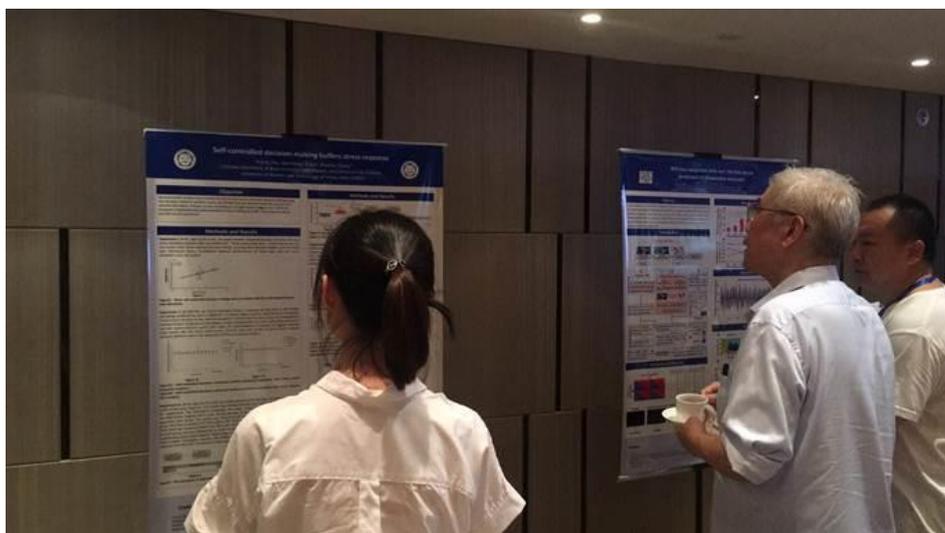
浙江大学汪蕾教授作《大脑决策的秘密》的报告，从大脑是一个复杂的神经网络系统说起，介绍决策评估的神经科学研究，探讨不同压力情况下大脑决策的神经反应。



浙江大学王小毅副教授作《消费神经科学研究如何实现营销理论创新》的报告，从神经科学对营销理论的意义出发，提出品牌延伸中的流畅性效应，并以两个研究为例进行阐述。



会议茶歇期间，专家学者就展示的 poster 进行深入交流。



清华大学马靓副教授作《基于可穿戴设备的作业管理》的报告，从人因工效学和研究的现实意义出发，以三大职业人群为主要案例阐述可穿戴设备的作业管理。



上海大学于晓宇教授作《神经科学赋能创业学的四个方向》的报告，从个体创业崛起的时代背景出发，介绍神经科学与神经创业学的渊源和现状，提出创业的五大影响因素，并对神经创业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做出一一阐述。



宁波大学尹军副教授作《Social thinking: Reasoning actions across social groups》的报告，介绍目标导向型和形式导向型的概念和生活实例，从社会群体性角度探究跨社会群体的推理行为。



浙江工业大学江程铭副教授作《少即是多，少还是少？——前置小损失对延迟收益评价和选择的影响》的报告，从延迟结果和跨期选择的定义概念出发，利用效用折扣模型进行前置小损失对延迟收益评价和选择的机制研究。

广东工业大学方慧博士作《越挫越勇还是一蹶不振：认知神经科学视角的实证研究》的报告，介绍胜任需要、内在动机的定义，从胜任需要挫败角度出发，对三个研究进行阐述。



CEBD 叶航教授应邀 在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作学术报告



2019年6月14日上午，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举行了第一期启真学术讲堂。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CEBD）学术委员主席兼首席专家叶航教授应邀作题为《道德哲学的自然主义基础 —— “跨学科社会科学译丛”解读》的学术讲座。该讲座由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赵鼎新教授主持。



近年来，“跨学科社会科学译丛”由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这套丛书虽分属生物进化论、脑科学和人类学等不同学科，但其背后的主题是一致的，即人类道德行为具有坚实的自然主义基础，它可以弥合“道德义务论”和“道德后果论”两大道德哲学的经典传统，从而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人类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起源与演化等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



讲座伊始，叶航概略介绍了“道德义务论”和“道德后果论”的相关理论背景。齐美尔首发“社会何以可能”、“道德何以可能”系列之问，叶航引入了对这一问题的两派解释脉络：其一为康德至罗尔斯和宾莫尔的所谓“道德义务论”，道德律令、无知之幕和自然正义均假设了道德的先验存在；其二为达尔文至威尔逊和诺瓦克等的所谓“道德后果论”，该派解释强调进化过程中的群体选择理论，认为道德是人类适应生存环境的结果。这种解释受到来自生物学内部的诸多诘难，最为典型的是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理论。

接下来，叶航详细解读了“跨学科社会科学译丛”。这套译丛选自国外生物进化论、脑科学和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最新成果，是

对群体选择理论及道德哲学的自然主义基础的有力回应。《基因之外——文化如何改变人类演化》、《大脑与文化》和《地球的主人——探寻人类的起源》探讨了基因与文化的共生演化问题。

《合作的物种——人类的互惠性及其演化》、《被狩猎的人类——灵长类、捕食者和人类的演》和《道德的起源——美德、利他、羞耻的演化》重新阐释了群体选择理论。这些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人类道德行为有坚实的自然主义基础。

最后，叶航总结道：“后果论”与“义务论”是道德哲学的两大经典传统，它们导致伦理思想的对峙，至今难以弥合。也许，只有重归达尔文创立的自然观，我们才能在两个不同维度上寻求它们之间的统一：从物种演化角度看，人类道德心智的形成是“后果论”的，因为它无非是我们适应生存环境的产物；但从个人行为角度看，人类道德心智的实践又是“义务论”的，因为道德心智一经形成，就成了我们无条件的行为目的。你可以想象其中包含的逻辑——由物种演化所体现的功利主义后果，恰恰需要通过个人无功利的道德义务才能实现。

讲座交流环节，赵鼎新、郭静云、赵琦等学者分别就小规模合作和大规模合作各自的基础及相互间的结合点、合作行为本身能

否上升到道德层面、合作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如何遗传、进化中的道德情感能力是如何产生的等问题与叶航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CEBD 叶航教授和姜树广副教授 的论文在《经济研究》发表

由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韦倩教授和孙瑞琪博士生，CEBD 叶航教授和姜树广博士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技术合作研究的成果《协调性惩罚与人类合作的演化》一文，在《经济研究》2019 年第 7 期发表。该文第一作者韦倩，通讯作者叶航。

该文认为，虽然惩罚可以维持合作的演化，却给惩罚者带来自然选择的适应性劣势，从而形成新的演化之谜。人类在漫长的发展中逐渐演进出各种巧妙的协调性惩罚行为，这无疑会降低惩罚成本或增加惩罚力度，当它们改变惩罚行为的成本劣势，使其达到成功演化的阈值范围时，反对惩罚的选择性压力就消失，从而可以支持利他性惩罚在大规模群体中演化。由于该文不再遵循惩罚者同质性假设，从而能够讨论各种协调性惩罚对群体合作秩序演进的影响。该文通过构建一个动态演化模型，模拟了人类祖先的一个典型狩猎采集社会，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设置了各种协调性惩罚的环境，并对比分析了它们对合作演化的影响。计算机仿真模拟的结果表明，在规模较大的情况下，非协调性惩罚很难维持群体合作的演化，而协调性惩罚则会明显提高群体合作水平，特别是在一致行动和权威惩罚的情景中，群体可以实现高的合作水平。

人类合作之谜堪称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难题之一。2005年,《科学》杂志在创刊125周年之际,曾组织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提出了25个“驱动基础科学研究以及决定未来研究方向”的大难题,其中23个是纯粹的自然科学问题,而只有两个问题是社会科学问题,一个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观点会继续错下去吗”,另一个就是“人类合作行为如何演进”。英国皇家学会主席 Robert May 曾说过:“人类社会和其他动物种群中的合作行为如何演化和维持是演化生物学和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未解之谜”。2016年,《科学》杂志又对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进行了调查,“人类合作行为如何发展”再次入选25个最具挑战性科学难题之一。

虽然依靠惩罚可以维持群体合作的演化,但是惩罚会给惩罚者带来自然选择上的适应性劣势,从而带来新的演化之谜——降低惩罚者适应性的惩罚行为何以成功演化。作者认为,当面对背叛行为时,具有高级认知能力的人类既不会像其他物种那样转身离去,也不会简单、机械地对背叛者进行惩罚,而是会利用各种机制协调对付背叛者。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人类逐渐发展出了各种巧妙的协调性惩罚行为,这些协调无疑会降低惩罚成本。当它们改变惩罚行为的成本劣势,使其达到成功演化的阈值范围时,反对惩罚的选择性压力就消失,从而可以支持利他性惩罚在大规模群体中演化。该文不再假设惩罚者是同质的,而是假设其惩罚能力服从正态分布,这样便可以讨论各种协调性惩罚对群体

合作秩序演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动态演化模型，并根据文献资料确定了合适的参数取值范围，模拟了人类祖先的一个典型狩猎采集社会，对非协调性惩罚、一致行动以及代理惩罚（包括雇佣惩罚和权威惩罚两种情况）等情景下的群体合作的演化进行了仿真分析。在这几种情景下，设置各参数的取值完全相同，这样，演化结果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不同的协调机制所致。仿真结果表明，非协调性惩罚很难维持较大规模群体中合作的演化，而协调性惩罚会提高群体合作水平，特别是在一致行动和权威惩罚的情景中，群体在大部分时间内都可以实现较高程度的合作。

必须要说明的是，虽然许多文献都对降低自身适应性的惩罚行为何以成功演化这一“二阶搭便车”问题进行了研究，但解释依然还不完美。本文只是提出了一个思路，有创新也有缺陷。协调虽然可以降低惩罚成本，但是，协调本身也需要成本。因此，惩罚者会在协调和不惩罚之间进行权衡，这需要进行后续更加深入的研究。另外，我们从来不认为非协调性惩罚状态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而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参照系，来讨论协调性惩罚的作用，就像物理研究的真空状态。